

关于中日关系的若干思考

——日本：是“善邻”还是“恶邻”

冯昭奎

【内容提要】 当今世界，大国实力对比与 GDP 规模及与之关联的军费规模有密切关系，其中 GDP 与军费增长背后的科技实力对比同样不容轻视。日本仍是科技大国，科技是现代战争的核心战斗力，必须高度关注日本科技实力的军事意义。在修宪问题上，自民党政府修改和平宪法的努力一次次失败，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和平宪法的图谋至今未能冲破作为和平宪法的创造者和维护者——多数日本人民的心理底线。不过，即便安倍实现“修宪”，将自卫队写入日本新宪法，也不意味着军国主义复活。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将少数军国主义者和作为受害者的日本国民区分开来的“两分论”与何方提出的“全民犯罪论”并非相互对立，完全可以统一起来，“全民犯罪论”启示我们，中日历史问题既包括反对日本统治阶层政要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言行，更包括作为那场战争胜利者的中华民族对犯过错误的日本民族的争取、教育和感召工作。当今，在中国周边已经出现新的“三个世界”架构，中美各为一极，其间存在许多中间国家，应该在“新三个世界”架构中对中日关系进行“再定义”。

【关键词】 中日关系 科技实力 和平宪法 “全民犯罪论” “新三个世界”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章编号】** 1003-4048 (2017) 03-0001-1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496/j.cnki.rbyj.2017.03.001

【作者简介】 冯昭奎，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7）。

本文主要围绕中日关系的一些热点问题，包括中日国力之对比、日本科技实力的军事意义、日本“修宪”问题、中国对日政策问题，中日关系“再定义”问题，提出笔者的一些初步思考，就教于关心中日关系问题的读者。

一、关于中日国力之对比

在两千多年来中日交往史上，中日两国从来都处在“一强一弱”状态，当中国强日本弱时，两国关系基本保持和平状态，中国领先并帮助日本；当日本强中国弱时，两国则陷入战争状态，日本欺负甚至侵略中国。进入 21 世纪，中日

进入了“两强并存”状态，有人笃信“一林不容二虎”，认为这种“两强并存”状态是导致中日产生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原因，只有当中日两国实力对比再次走向中国强日本弱的状态，中日关系才会太平。不管这种观点是否准确，中日国力之对比应该是研究中日关系的一个基础性课题，而按照“一个良好的中日关系需以‘中强日弱’为条件”的观点，首先需要弄清楚衡量中日国力再次达到“中强日弱”状态的标准是什么，即中国 GDP 要增长到日本的多少倍，才能说达到“中强日弱”的状态？笔者曾写过一篇题为“经济超日本 10 倍，中日才太平”^[1]的文章，认为“中日实

力对比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基本参数”，指出在“‘中强日弱’历史时留给人们的深刻教训是：对中国来说，仅先进不足以使日本追随；仅强大也不足以使日本服膺，只有既先进又强大，让日本对你既服气又服输，中日关系才能太平，才能‘友好’”，显然，文章所称的“中日实力对比”不仅仅是GDP（经济规模）对比，而且包括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将自己建设成为一个文明先进的国家，软硬实力兼备，才能真正让日本“服气”。但文章题目却给人一种GDP决定国力的印象，这是笔者必须加以检讨的，因为这个题目可能误导一些读者陷入一种“认识偏差”，这就是仅仅以GDP来衡量国力。

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基本上有两种方法，其一是“单一指标法”，将军事力、军费支出等同于“国力”，^[2]或者以经济实力（规模）作为“国力”的代表性指标；其二是“多指标合成法”，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不仅决定于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或某一单方面的力量，更主要取决于“综合国力”。“综合国力”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政治学者H.J. 摩根索和R.S. 克莱因。H.J. 摩根索认为构成国力的要素有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事准备、人口、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质量和政府质量9项。^[3]R.S. 克莱因则提出了国力评估公式。^①

单一指标法的优点是易于进行数字比较，对现有国力的把握显得非常明确，但存在过于简单，以偏概全的缺点；多指标方法对国力认识比较系统和全面，但在多指标合成过程中，由于合成方法和对各项指标所加的“权重”^②不同等原因，往往会造成测度结果有较大随意性，最后评价结果往往各持己见，很不一致。在我国，“综合国力论”曾盛行一时，如黄硕风著《综合国力新论》^[4]等，但近年来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使用以GDP作为“国力”代表性指标的单一指标法，比如2016年世界各国GDP排名依次为美国、中国、日本、德国、英国……，在很多场合就被作为上述国家实力对比的依据。另外，据Y&R BAV咨询

公司及宾大沃顿商学院发布的调查，2017年全球“最有实力国家”（Best Countries: Power）的排名前五位依次为美国、俄国、中国、英国、德国，法国为第六位，日本为第七位……，尽管这个排名未必完全准确，却是有关世界各国实力对比的颇有分量的最新调查结果，这个结果显然与GDP的名次有很大差异，日本从GDP的“第三位大国”变为“最有实力国家”的第七名。^[5]该调查还列出了2017年全球“最好的国家”（Best Countries），日本被排在“最好的国家”的第五位，前四名依次为瑞士、加拿大、英国、德国。

各种有关“国力”排名的差异和歧见，说明至今还没有找到有关各国“国力”排序的统一、明确指标，所以一些人便“偷懒”地以GDP作为“国力”对比之依据。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日益孕育兴起”，^[6]并强调说：“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7]“十六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多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影响了世界力量格局。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8]“近代以来，中国屡屡被经济总量远不如我们的国家打败，为什么？其实，不是输在经济规模上，而是输在科技落后上。”^[9]依据历史经验和教训，应该认识到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实力对比虽然与GDP规模以及随GDP增长而“水涨船高”的军费规模有密切关系，但决不能轻视GDP与军费增长背后的科技实力对比，应该改变那种简单地把GDP对比等同为大国实力对比的习惯性思维。虽然GDP作为一种经过多次改进和完善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核心指标，依然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但我们至少应该将GDP比较与科技实力比较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以“科技实力比较”纠正以“GDP比较”等同“国力比较”所导致的对国家实力对比的“认知偏差”，以便得出更加贴近实际的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的实力比较。需要指出，纠正国力对

① 该公式是： $PP=(C+E+M) \times (S+W)$ ；其中，c代表人口和领土，e代表经济实力，m代表军事实力，s代表战略意图，w代表国家意志。

② “权重”是要从若干评价指标中分出轻重来，某一指标的权重是指该指标在整体评价中的相对重要程度。

比的“认知偏差”，有助于克服对本国实力的过度自信或过度不自信，对“对手国家”实力的过高估计或过低估计，对于防止由这种认知偏差所导致的重大的战略误判应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科技实力对比不像 GDP 那样有一个明确集中、方便引用的数字指标，而必须找到能真正务实地体现科技实力的一些数据。笔者认为，综合利用以下六种数据，可基本上推断各国的科技实力。

其一，研发经费及其占 GDP 的比例。2015 年主要科技先进国家总研发经费的前五名位次是美、中、日、德、韩；研发经费占 GDP 比例排名依次是以色列、韩国、日本、瑞典、澳大利亚。^[10]以 2014 年与 2000 年的研发经费之比（反映进入 21 世纪以来各国研发经费的增长速度）来看，中国占第一位，为 8.4，韩国占第二位，为 3.4，德、日、美均在 1.3-1.4 倍之间。以上有关各国总研发经费、研发经费占 GDP 比例、进入 21 世纪以来研发经费增长倍数这 3 个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下事实：美、中、日是当今世界上总研发经费金额最大的国家；以色列、韩、日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视科技的三个国家；中国则是 2000 年以来的 14 年间研发经费增长最快的国家，反映了中国也是今世界上最重视科技的国家之一^[11]；日本是总研发经费和研发经费占 GDP 比例均占第三名的国家；未进入 GDP 前 10 名的韩国不仅在研发经费方面跃居世界第五位，而且在研发经费占 GDP 比例方面居世界第二位。

其二，技术贸易顺差。近年来主要科技先进国家的技术贸易收支比的位次排列是：日本居首位，为 7.1；其次是英国的 2.4，美国的 1.5，韩国则小于 1（为逆差），^[12]这反映了日本的技术竞争力很强，是靠技术贸易净出口（顺差）赚大钱的国家（例如 2015 年日本的技术出口达 3.9 万亿日元，技术进口为 6000 亿日元，技术贸易的年纯收入达 3.3 万亿日元），韩国则是靠技术贸易净进口（逆差）“花钱”猛追更先进者的国家。

其三，专利数量与质量。主要科技先进国家 2016 年专利数量的前五名位次排列是：美（56440）、日（45220）、中（43128）、德（18302）、韩（15554）。然而，专利不仅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看基础型、原创型、高价值的核心专利的比重。统计表明，日本核心科技专利占世界第一，占比达 80% 以上，而且日本的专利授权率高达 80%，^[13]反映其专利申请的质量较高。

其四，科研论文及其被引用情况和诺贝尔获奖人数。近年来主要科技先进国家科研论文数的位次排列是：美、中、德、英、法、日、韩；被引用次数在上位 10% 的论文数、简称 TOP10% 论文数的位次排列是：美、中、英、德、法、日、韩。日本的名次被中国大大超过，^①这反映了近年来中国的基础研究水平提高很快，而日本的基础研究水平则相对下降。不过，这个事实似乎与日本诺贝尔获奖者人数的增加形成矛盾：迄今日本人诺贝尔获奖者达 23 人，2000 年以来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获奖者达 17 人，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然而，考虑到这些日本人获奖者的成果大多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日本加大对基础研究投入时期产生的，与进入 21 世纪以后日本基础研究水平相对下降的事实并不矛盾。不过，日本人获奖者人数多也反映了日本基础研究积累还是相当深厚的。

其五，创新能力、创新质量与创新集群排名^②。据 2017 年《全球创新指数研究报告》(GII)，在全球 132 个经济体中，主要科技先进国家创新能力的位次排列是：瑞士、瑞典、荷兰、美国、英国，日本为第 14 名，中国从 2016 年的第 25 名升至第 22 名，俄罗斯为第 45 名，印度为第 60 名。该报告关于创新质量^③的位次列（前五名）是：美国、日本、瑞士、德国、英国。2017 年 GII 报告首次尝试对区域创新集群的指数评价。在过去十年的研究中，区域创新集群带动国家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性愈加明显，2017 年 GII 报告利用大数据分析，聚焦国际发明专利的分指标，构造出 25

① 日媒：中国科研论文发表数量赶超日本排名 <http://www.99lww.com/riyulunwen/773.html>。

② 这里需要更正一个错误的概念，即认为只有完成品的创新才算“创新”，而中间品的创新只能算作“改良”，应该承认，零部件等中间品的创新也是不折不扣的“创新”。

③ 所谓“创新质量”主要看是创新为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因而比“创新数量”更能体现一个国家的创新实力。

个先进的区域创新集群的排名,前四名依次为:东京-横滨(日本)、深圳-香港(中国)、硅谷(美国)、首尔(韩国)。^[14]又据《Economist》发表2015国家创新质量(InnovationQuality)报告,日本位列世界第三。麦肯锡2013发布研究报告,罗列了有望改变生活、商业和全球经济的12大新兴颠覆技术——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机器人、次世代基因组技术、自动化交通、能源存储技术、3D打印、次世代材料技术、非常规油气勘探、资源再利用等,目前日本全力投入上述技术,而且90%已经做到了世界前三。某些科研已经做到了世界第一,比如大数据、云计算、机器人、碳纤维、锂电池、资源再利用等。^[15]

其六,企业的“寿命”。据统计全世界创业超过200年的企业中,日本企业占了近半;创业超过100年的日本企业达2.6万家。显然,企业的寿命越长,就越有时间磨练和形成自己的技术特长,越有时间培养和训练员工的工匠精神。日本拥有大批几十年如一日地钻研、磨其“一技之长”的中小企业,并形成若干个制造中间产品和机械零部件的中小企业集群,^①为大企业和高技术创新企业服务。其中不少中小企业拥有所谓“独家技术”,被学者称为“日本的国宝”,很多中小企业之所以拥有令人称羡的一技之长,显然与前面所说的企业“寿命”有关。

以上有关科技实力的指标和位次排列虽然不能像GDP那样构成一个集中而统一的指标,但通过综合分析上述有关科技实力的各种指标,可以判断出相关各国追赶新科技革命的“力度”和“紧迫感”,以此为指标的各国排序为美、日、中、德、英、法、韩、以色列、俄罗斯、印度……。这意味着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孕育兴起,世界各国追赶新科技革命的“力度”和“紧迫感”的差别将可能影响今后一二十年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国家实力对比,重塑相关国家竞争力在全球位置。其中,特别是对日本,不能因其GDP落后

于我国的差距逐年拉大而“小看了它”,应该指出在我国国内舆论中确实存在着“低估日本”的倾向,上述数据说明日本仍然是一个科技大国,在国际竞争关系中日本依旧是一大势力,不宜低估日本成为我们的“善邻”或者“恶邻”,对我国可能带来的“正面影响”或者“负面影响”。

二、从中日关系看日本科技实力的军事意义

习近平说:“科技是现代战争核心战斗力”。^[16]对于日本科技实力的军事意义,必须给予高度的关注,而且需要特别从中日关系的角度来加以分析。

2016年中国的GDP已经达到日本的2.94倍,中国的军费已经达到日本的3.96倍,到2020年军费估计将达到日本的6倍。这几年中国海军力量实现大发展,仅在2016年就有18艘主力舰艇下水,2017年4月又有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成功下水。尽管如此,考虑到日本科技实力仍然强于中国,而且在军民两用技术等方面具有一些独特优势。因此,虽然中国的军费已达到日本的近4倍,却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军力也达到了日本的近4倍。^②对于以双方科技实力支撑的中日两国军力比较,需在三种具体战争场景下进行分析:其一是战斗主要在海上和离岛进行,而不延烧到两国本土的“小规模局部战争”;其二是战火延烧到两国本土的“中规模局部战争”;其三是将其他大国卷进来的大规模的、甚至是“世界大战级”的核战争。需要注意,在上述三种不同的战争场景下,会呈现出三种不同的中日军力对比。如果不区分具体的战争规模和场景,似乎就没有必要分析什么“军力对比”。因为中日之间一旦发生“世界大战级”的核战争,不管日本使用多少反导系统来防御,中国无需倾其全部、仅需一部分中程核导弹甚至仅仅是常规中程导弹,就可能将布满数十座核电站的整个日本毁灭。显然,中日双方都不会打一场招致让“人类文明退回到石器时代”(爱

^① 例如苹果手机差不多一半左右的零部件是日本中小企业生产的,从苹果手机零部件那里最能赚到钱的也是日本企业。

^② 需要指出的是,在海军方面,日本已拥有了4艘大型“准航母”(日本国内将其称为“直升机驱逐舰”);在空军方面,日本依靠自身科技实力已能在其国内组装38架F-35A隐形战机战斗机(另有4架由原厂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并已交付),并在日本国内建立F-35战机的维修中心,为在亚太地区部署的F-35服务等。

因斯坦语)^①的“世界大战级”的核战争，甚至都不会有打一场“中规模局部战争”，因为那样会损害双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果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何况与日本相比中国拥有陆基洲际弹道核导弹、潜地弹道核导弹、战略轰炸机等战略武器，在这种“非对称”状态下，日本会力图避免“把仗打得太大”。总之，在避免打中等规模以上战争这个问题上，应该说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是有“共识”的，如果中日发生“中等”以上的大规模战争，双方都会“输得很惨”，特别是国土面积狭窄、缺乏地理纵深、产业与人口高度集中在东京等大都市圈的日本会“输得更惨”，当然中国的东部发达地区也难免受到严重伤害。总之，中日爆发大规模战争的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而不可能有真正的“胜者”。

第一，从中日岛争的视角。

如果中日钓鱼岛争端升级、矛盾激化，导致双方军机军舰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擦枪走火，若得不到及时管控，就很可能升级为在海上和离岛展开的“小规模局部战争”。日本近年来在钓鱼岛问题上坚持采取强硬立场，步步为营地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反映了日方对擦枪走火导致“小规模局部战争”有所准备，而且自认为在发生“小规模局部战争”的场合，其先进科技力量和发达工业体系将可能迅速转入军事体制并发挥

巨大潜力，凭借其高精尖的海空武器的质量优势，具备与中国“有一拼”的实力。在这种强硬政策背后，是日本对其科技与工业实力以及海空武器装备性能质量的一种“自信”。但是人们可以相信，不管是发生何种规模的战争，日本必败无疑。当然，美军即使在中日发生“小规模局部战争”的场合也有可能“帮日本一把”，形成日美对中国的“二对一”局面，这也成为日本“军事自信”的重要来源。^②对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坚持“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方针，另一方面在钓鱼岛争端问题上，只要日本不挑衅，在岛屿争端问题上宜保持战略耐心，沉着应对，不

急于求成，因为时间显然在不断拉大我方的对日领先差距。

第二，从日本配合美国亚太战略乃至全球战略的角度。

日本的科技实力不仅是支撑其武器装备先进性的可靠力量，而且对美国的亚太乃至全球军事战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利用价值。

战后，由于日本推行“经济增长至上”方针，加之战败国地位使其在发展军事技术方面受到一定限制，因此在战前工业化基础上，民间企业将战前研制武器装备的军事技术力量转向发展民生技术，并利用日美同盟关系获取美国为军事目的而开发的半导体集成电路等先进技术用于研制民用产品，通过上述“两方面的军转民”（从战前日本到战后日本的“军转民”和从战后美国军事部门到战后日本民生部门的“军转民”），日本民间企业通过开发时刻都要经受激烈的市场竞争考验的各种民用产品，使其在很多重要的民用技术领域获得了全面而迅猛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很多重要的民用技术领域甚至超过美国之际，美国军方及时发现日本原本起源于“军转民”的很多民用技术其实具有重要的军事利用（转用）价值。1983年时任总统里根提出“星球大战”之际，美国军方要求日本提供16项军民两用技术，其中既包括半导体芯片技术，也包括日本民间企业为保护消费者不受微波炉电磁辐射影响而开发的“吸波材料”样品，通过分析这种样品，很可能有助于美军不断改进隐形战略轰炸机所需的隐形材料。此后美国国防部派遣专门小组常驻日本，密切跟踪日本民间企业的技术发展，不断从日本民生技术中发掘具有军事利用价值的新技术成果，直到近年来美国在航天器和反导系统等最尖端武器研发方面利用日本的独特技术（例如2006年3月美国海军成功试射了一枚安装有日本研发的弹头锥体——“鼻锥”的海基拦截导弹“标准3”），致使日本擅长的“军民两用技术”成为美国推行亚太乃至全球军事战略的得力工具，日美

^① 爱因斯坦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用什么武器，但第四次人类一定使用的是石头和木棍。”第3次世界大战是什么样子？
[OL].<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99617523834558325.html>。

^②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美军以三代、四代装备为主体，俄军主要是二代、三代装备、少量四代装备。

科技合作则成为两国军事同盟关系的重要联系纽带。当然，也应看到日美科技关系既有合作也有矛盾，双方都不会“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技术特长提供给对方，特别是美国很清楚日本愿意向美国提供军民两用技术，在根本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通过合作渠道获取美国先进的军事技术。

第三，从日本配合美国构建针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的角度。

尽管美国想把日本作为自己的“工具”，但日本未必情愿永远充当美国的忠实工具，所以从长远看，不宜简单地以“工具论”来认识日美关系。不过，至少在现阶段，日本依仗其先进的科技实力不仅向美国提供军事技术，向中国周边国家提供各种武器装备，显然有配合美国构建针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的用心。2014年8月日本向越南提供6艘二手船作为海洋巡逻船，加强越南在南海的军事力量；2017年5月日本派“出云”号直升机航母远赴南海，经停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和斯里兰卡，然后于7月在马拉巴尔海岸参加美国和印度舰艇的联合海上演习。日本诸如此类的动作显示日本右翼势力不仅要在东海与中国对峙，而且向着南海海域直至印度洋显示其存在感，企图配合美国扩大对中国的“大包围圈”，牵制中国海军经略两大洋走向全世界。

美日等国构建针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固然有伺机在某个“圈点”挑起局部军事冲突，伺机制造军事热点的企图，但归根结底是企图让中国陷入不得不与美国及其盟国、伙伴国进行“以寡敌众”的军备竞赛的战略陷阱，使中国重蹈苏联被美苏军备竞赛彻底拖垮的覆辙。军备竞赛其实就是“相互耗”，如今美国担心在经济方面耗不过中国，就联合其众多的盟国、伙伴国一起跟中国“耗”，“以众敌寡”，企图在中国的薄弱环节——生态环境方面“耗垮”中国。习近平主席说：“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7]中国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上限，生态环境特别是大气、水、土壤污染严重，^[18]全球气候变暖还将进一步加大极端

天气、极端干旱等问题对中国大陆环境的影响，特别是中国有十几个重要冰川由于气候变暖而融化，其中仅青藏高原冰川融化^①就可能使以冰川融水为水源的黄河和长江面临严重缺水的问题，还可能成为青藏铁路稳定的隐患。总之，环境安全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短板”。在今后大国竞争中，我们最可能输掉的是环境。为此我们必须警惕外部势力企图通过挑动军备竞赛在环境问题上从内部“耗垮”中国的企图。

三、从战后日本宪法的历史看安倍“修宪”

在一些人看来，战后日本宪法是美国占领军主导制定的，不是日本人自己制定的宪法，而且历经70年“一字未改”，如今日本要做一个“正常国家”，理应具备主权国家的各种权力，至少应该有一部适应当今国内外形势而非战后初期国内外形势、并且由日本人自己制定的宪法。因此，不乏有人对于安倍决心修改宪法的“政治理想”感到可以给予一定理解，日本国内民众也有一部分人支持“修宪”，当然，更多的日本人严重质疑修宪的必要性，特别是对于安倍要修改宪法第9条，更是反对之声不绝于耳。

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曾经多次修改宪法，即以我国而言，大致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共对宪法修改了6次。^①然而，为什么战后日本的宪法从1946年制定、1947年正式生效以来，历经整整70年，却至今“一字未动”地延续下来，不曾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进行过修改呢？

首先，战后日本宪法是作为二战战败国的宪法，这虽然不成为战后日本宪法不能修改的原因，但是作为战败国，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其宪法的形成往往经历十分曲折的过程。如同是二战战败国，德国的“基本法”于1949年5月23日获得通过，次日即1949年5月24日生效，标志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成立。然而，当初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并没有打算将“基本法”作为长期有效的宪法，因为德国在二战后曾被分割为

^① 过去30年间，青藏高原及其相邻地区的冰川面积由5.3万平方公里缩减至4.5万平方公里，退缩幅度达15%，而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自然升温是导致青藏高原冰川消融的主要原因（青藏高原冰川过去30年间退缩15% [OL].<http://pic.people.com.cn/n/2014/0521/c1016-25047825.html>）。

“西德”(西方占领区)和“东德”(苏联占领区),“西德”国会参议院认为会很快与“东德”合并统一,所以只是制定了一个临时性质的“基本法”。但其“临时”性质拖了41年零5个月,直到1990年10月东西德合并统一,德国的“基本法”才成为整个德国的“宪法”。其后在“西德”与“东德”的“磨合”过程中,又经过了多次修改。这意味着与战后日本宪法70年“一字未改”相反,德国从“基本法”到宪法却是一改再改。造成日德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战后德国长期被美国等西方国家与苏联分而治之,分久又合,而战后日本则基本上被美国单独占领后,又作为美国的从属盟国存在至今。

战后日本宪法是在美军以所谓“驻日盟军总部”名义实施对日单独占领的情况下制定的,这成为日本国内“修宪”势力强烈要求“由日本人亲自制定一部属于日本国的宪法”的理由。然而,在事实上,战后《日本国宪法》并非是美国单方面强加给日本的,1946年11月正式公布的新宪法草案是在日本进步学者组成的宪法研究组织提交的新宪法草案的基础上制定的。这个新宪法草案公布出来后,并没有立即生效,而是被分发到日本各地进行讨论,在一段时间里宪法成了人们在街谈巷议中、报纸上甚至在家庭中讨论和辩论的焦点,日本政府还在报纸和电台里安排了大规模的教育性节目,解释草案的要点并解答问题,人们在认真的辩论中提出各种修改意见。至1947年5月3日,经过1000多处文字修改,《日本国宪法》才正式生效施行,这意味着在战后日本宪法形成过程中,当时的日本人民是重要的“制定者”之一。

杨夏鸣认为:“美国占领当局、日本官僚、日本进步力量和远东委员会是影响日本宪法制定的四种政治力量,日本宪法及第九条的产生是这四种力量互动的结果。”至于使战后日本宪法之所以成为“和平宪法”的宪法第9条,归根到底“是日本人民的选择、历史的必然”。^[19]以下事实足以证明,宪法第9条是日本人民的选择和创造,而且日本人民也是宪法第9条的坚定维护者,这成

为自民党某些政治家以篡改宪法第9条为目的的“修宪”企图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也成为制定于1946年、生效于1947年的战后日本宪法直至70年后的今天依然未作任何改动:

其一,战后日本进步力量是影响宪法制定的一股重要力量,很多政党、组织和个人都起草了各自的宪法修正案,其中一些对占领当局的宪法起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占领当局提出的宪法草案主要是在战后日本进步力量提出的宪法草案的基础上形成的。宪法第九条的提出是日本民族对战争失败及其所带来的深重灾难进行反思的结果,是日本总结战争教训之后向世界作出的“公约”。

其二,1946年鸠山一郎在解释社会党为什么支持新宪法时说:“因为放弃战争、放弃军队的宪法第九条绝不是外部命令和强加的,而是表达了涌动在日本人民内心深处的强烈愿望。”^[20]

其三,1950年麦克阿瑟新年献词中说:(宪法第九条)是“日本人思想的产物”^[21]。1951年在为其被解职举行的参议院听证会上,麦克阿瑟进一步说明放弃战争和军队的条款最早是由日本币原首相提出来的^[22]。

其四,1957年成立的日本宪法调查委员会主席高柳起初认为宪法第九条是由麦克阿瑟首先提出来的,但经过7年的调查后,他的结论是:第九条起源于东京而不是华盛顿,它首先是由币原首相提出的,而不是麦克阿瑟^[23]。币原还说:“日本是一个穷国,无论如何都不能把财力花在战备上了。国家所剩下的任何资源都应当用于扶持经济。”^[24]

正是由于日本进步力量和有识政治家的努力,才有了《日本国宪法》第二章第九条中有了如下的表述:“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由此可见,归根到底日本人民是“和平宪法”的创造者。

其五,多届自民党政府“修宪”的核心是要修改第9条,从而遭遇坚持维护宪法第9条的多

① 包括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内,我国于1954年、1975年、1978年和1982年先后制定了4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99年3月15日和2004年3月14日又两次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数日本人民的抵制，使正当的“修宪”陷入了“一方主张要修宪就要修改第9条，另一方则主张要修改第9条就不能修宪”的僵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驻日美军将大部分兵力投入到了朝鲜战场，遂指令日本政府迅速组建“警察预备队”以强化其在“共产主义势力相当活跃”的日本国内的统治能力。1952年10月“警察预备队”改称“保安队”，1954年6月“保安队”又改为拥有陆海空三军的“自卫队”。这导致宣称“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的宪法第九条和自卫队的现实存在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日本政坛一些人物蠢蠢欲动，要求通过修改宪法来支持日本重新武装。1957年2月岸信介出任日本首相，此人曾被定为甲级战犯关进东京巢鸭监狱，于1948年出狱后，组织以“修改宪法”为纲领的政治团体“日本重建同盟”，堪称修宪派代表人物。当上首相的岸信介甚至狂妄地提出“为了自卫，即使在现行宪法下也允许拥有核武器。”由于和平宪法的理念在日本国民中已深入人心，致使岸信介在国会选举中未能得到修宪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其修宪企图遭到失败。但岸信介并没有放弃，作为修宪的前奏，岸政府与美国签订新的日美安保条约，激起了日本国民的强烈抗议，掀起了战后最大规模的反战群众运动“安保斗争”，导致1960年6月岸信介被迫辞职，新上台的池田首相表示，不再考虑修改宪法的问题。其后，虽然中曾根康弘等人也曾企图修宪，最后均以失败告终。

战后，日本人民在数十年如一日地维护和平宪法的同时，创造了战后日本和平发展的历史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在大多数日本人民看来，战后日本的和平发展与“和平宪法”是密不可分，自民党政府的修宪努力一次次的失败，从根本上说作为和平宪法的创造者和维护者——多数日本人民的胜利。

其六，安倍晋三于2006年9月就任第90届日本首相，次年9月辞职，2012年12月再度就任第96届日本首相，2014年12月又成功连任日本第97任首相。2016年7月自民党和公民党的执政联盟在战后首次达到在众参两院均占据三分之二多数席位的局面，这意味着安倍可以随时启动修改宪法程序，实现其外祖父岸信介当年因为未能达到修

宪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而遭失败的修宪梦想。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安倍获得了对日本政治的无可争议的控制权，并让他获得了将修宪提交全民公投、实现修宪政治理想的千载难逢的良机”。^[25]

但是，安倍政府仍然面临维护和平宪法的广大日本国民的抵制，为此，自民党修宪推进总部决定采取迂回战术，在其拟定的修宪讨论蓝本中，将原来考虑将自卫队问题写入“第9条”之第三款的方案改为新设“第九条之二”，以显示“坚持由第一、第二款组成的现行第九条”、即不扩充和触动日本国民所维护的“第9条”本身的姿态，并将日本自卫队规定为“旨在防卫我国的必要最小限度的实力组织”，还写入了日本首相拥有自卫队的指挥监督权。在时间安排上，计划在2018年向国会提交新宪法草案并进行全面讨论，届时支持与反对修宪的势力将在国会进行对决，鉴于目前修宪势力超过国会2/3议席，所以最终草案应该会通过。之后，2019年进入国民讨论阶段，2020年完成修宪，当然，前提是安倍能顺利实现执政到2021年。

由于自民党在2017年7月举行的东京都议会选举中惨败，公明党内部有越来越多意见认为，“局面已经发生改变”，担心“强行推动修宪可能招致失败”，而且公明党虽然支持将自卫队写入宪法，但在自卫队作用问题上持鸽派态度，坚持把自卫队限定在专守防卫、救灾等“自卫”范畴。自民党则以扩大自卫队职能、使之超出“自卫”范畴为目的，两者显然存在较大分歧。安倍在“修宪”问题上不惜赌上自己的政治生命，近来随着安倍深陷加计学园丑闻、强推“共谋罪”法引起国民不满、自民党在东京都议会选举中遭遇惨败、防相辞职等问题，其个人和自民党的支持率跌破30%（在2017年8月初改组内阁后支持率有所上升）。有学者认为如果安倍下台，其修宪计划将可能“戛然而止”。然而，在当今日本，主张修宪的不只是安倍，也不只是自民党，如果其他自民党政治家取代安倍成为日本首相，也可能继续推行“修宪”政策。那种将中日关系改善完全寄希望于“安倍后”的观点很可能经不住时间的检验。与此同时，也不排除日本国内政治朝着有利于缓和乃至改善中日关系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最后需要指出，即便安倍或“安倍后”的什

么人实现了“修宪”，公然将自卫队写入日本新宪法，使日本成为“能够进行战争的国家”，那也是一只以现代军事手段一戳就破的“纸老虎”，只能给日本招来更大的战争危险。

三、历史问题与中日政治关系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关于历史问题的条款是“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个表态显然未能被中国人认可为“历史问题得到解决”。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凡是在历史问题上“失言”（其实是吐露真言）的内阁大臣大多遭到国民的反对，不得不辞职，反映了在中日复交后相当长时期，日本政要否定侵略战争的言行在大多数日本国民当中是不得人心的。1993年8月时任首相细川护熙和1995年8月时任首相村山富市的两次谈话都承认了日本侵略战争的事实，而且表示了反省和道歉^①。有人认为细川和村山谈话给中日历史问题“划上了句号”，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合适的，即以细川谈话来说，他虽然表示“我国过去的侵略行为及殖民地支配等，而感受过难以承受的痛苦与悲伤，我们再次致以深切的反省与歉意之情。”他在前面又说：“我国现在得以成为享受繁荣与和平的国家。这是建于上次大战中可敬的牺牲之上，是先辈人士功绩的成果，我认为决不能忘记。”把“侵略行为及殖民地支配”称之为“先辈人士功绩”，把为“侵略行为”而丧命称之为“可敬的牺牲”，显然是前后矛盾的。至于村山富市谈话应该说体现出了正视历史的态度，受到亚洲邻国的好评，但这是一位短期上台（1994~1995）的社会党人首相的谈话，而不是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人首相的谈话，在村山下台之后，随着自民党重掌政权，自民党人首相在历史问题上的表现就出现了反复和倒退，特别是小泉纯一

郎内阁时期（2001-2006年），中日围绕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发生了激烈的摩擦，出现了所谓“政冷经热”的奇特状态。到了2012年安倍第二次上台后，中日之间继续为日本首相在2013年12月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教科书问题而摩擦不断。这个事实证明，中日历史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因为某个首相有较好表态而划上一个明确的“句号”，也很难定下何年何月“把历史问题解决掉”的时间指标。

在中国，如何处理日本与中国等东亚各国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见。其一是“前提论”，即坚持认为解决好历史认识问题是发展中日关系的“前提”，反之，不解决好历史认识问题，中日关系就无法向前发展；其二是“双管齐下论”，解决历史问题和发展中日关系应该同时进行，或者说历史问题只有依托中日关系的发展，通过不断扩大中日人民的交流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感情的过程中逐渐得到解决，使两国民众的历史认识的“鸿沟”逐渐缩小而不是扩大；其三是“区分论”，即应该把少数日本军国主义与广大日本民众区分开来，侵略战争的责任在军国主义分子身上，不应该让广大日本民众“负战争责任”，在战后则应该把矛头指向坚持错误历史观的日本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他们必须负起责任为过去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向亚洲受害国家表示反省和道歉；其四是“全民犯罪论”，坚持这个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何方先生，他认为“总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把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还强调他们只是‘一小撮’）和支持并追随他们的群众严格区分开来。这就不如欧美人看德国。欧美人认为德国法西斯的胡作非为，既是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的罪行，也是整个德国民族的犯罪。而且直接蹂躏各国人民的正是出身于德国工农和知识分子的纳粹官兵。”何方还说：“我们过去一直把日本对外侵略只

^① 细川护熙首相的谈话内容是：“经过四十八年，我国现在得以成为享受繁荣与和平的国家。这是建于上次大战中可敬的牺牲之上，是先辈人士功绩的成果，我认为决不能忘记。我们希望借此机会，要向世界明确表示反省过去的历史，以及崭新的意志。由于我国过去的侵略行为及殖民地支配等，而感受过难以承受的痛苦与悲伤，我们再次致以深切的反省与歉意之情。”村山富市首相的谈话内容是：“在过去不太遥远的一个时期内，错误的国策使日本走上了战争道路，日本国民陷入了存亡的危机。由于进行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东亚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和痛苦。为避免将来重犯这样的错误，我毫不怀疑地面对这一历史事实，并再次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归罪于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一再说日本人民也和我们一样，都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这就混淆了是非。我们怎么能把跑到中国来进行抢劫、欺压和蹂躏中国老百姓的日本兵和遭受抢劫、欺压和蹂躏的中国老百姓相提并论呢？就是没有当兵来中国而留在日本从事生产劳动和其他工作的日本人，绝大多数也是忠于天皇、甘心在为‘大东亚圣战’作奉献的。真正反战的日本人恐怕是极少数。”^[26]

笔者认为，以上四种观点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是“前提论”与“双管齐下论”，第二组是“区分论”与“全民犯罪论”。关于“前提论”，笔者曾确切听说过对日工作老前辈张香山先生的一句质问：“历史问题什么时候成了中日关系的‘前提’啦？”显然，张老是不同意“前提论”的，因为把历史问题当作发展中日关系的“前提”，意味着只有解决了历史问题才能发展中日关系，至于历史问题如何才算得到“解决”，不同的人总是见仁见智，有些人认为只要日本领导人对侵略战争历史表示反省和道歉了（起码有“侵略”、“反省”、“道歉”等关键词），历史问题就算解决了；有些人认为尽管有些日本领导人对侵略战争历史表示了反省和道歉，但总觉得他们“不够真诚”，“不是发自内心”，与1970年12月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冒着凛冽寒风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双腿下跪的举动相比“差距太大”。与之相反，“双管齐下论”恰恰是把“发展中日关系”作为解决历史问题的“前提”，这意味着以上两种观点的“前提”是倒置的。

下面再讨论第二组“区分论”与“全民犯罪论”。在笔者看来，经过我们党长期的宣传教育，“区分论”是无数关心中日关系的中国人相当熟悉的一种观点，而“全民犯罪论”则令人感到陌生和新鲜。日本学者毛里和子认为：“将极少数的军国主义者和作为受害者的日本国民区分开来这样的两分论，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对日战略的两大支柱之一。另一支柱是区别美日、争取日本战略。这真实反映了冷战时期的国际对立。到了2012年，何方说这个‘二分论’是错误的。支撑日中关系基础的两大支柱之一的‘二分论’被看做错误而遭遇否定的话，则日中关系本身……行将崩溃，今后又能以什么作为基础来重

建日中关系呢？”^[27]毛里和子把“区分论”与“全民犯罪论”对立看待，然而笔者认为“两分论”与何方的“全民犯罪论”并非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起来。即尽管“全民犯罪”是事实，但战前与战争期间少数军国主义统治者所犯的罪与日本普通民众所犯的罪显然是有区别的，前者所犯的罪是发动侵略战争罪、破坏和平罪和反人类罪，而后者所犯的罪是广大日本民众由于受欺骗、受胁迫或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进而走上中国战场杀害中国军民等具体罪行以及在日本国内参加各种支持侵略战争的错误行为，显然，这两种罪行是不同的，应该加以区别对待。

正如何方所说：“今天，我们应该致力于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增进好感。事实证明，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相互感情越不好（甚至相互厌恶和敌视），一些‘不认罪’的日本人就越不会认罪，中日历史问题就越难以解决。只有通过努力扩大中日交流，消除部分民众相互间的厌恶和敌意，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好感，才能有助于双方在历史问题上逐步取得较大共识。”^[28]从这个角度看，应该说何方的“全民犯罪论”对于解决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是有积极意义的，该观点指出了中日间的历史问题既包括反对日本统治阶层中的政要乃至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言行，更包括作为那场战争的胜利者的中华民族对犯过错误的日本民族的争取、教育和感召工作，这项工作应该是更为根本的，但需要开展长期的、耐心的民族对民族的教育和影响工作，只能通过加强两个民族之间的密切的人文对话与思想交流来一起走向共同反对侵略战争的道德高地，达到两个民族“民心相通，文化互鉴”的文明境界。

事实表明，中日民众相互间的厌恶和敌意会随着两国政治关系的恶化而急速上升，也会随着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而逐渐减弱。既然如上所述“消除中日民众相互间的厌恶和敌意有助于双方在历史问题上取得较多共识”，人们不难做出这样的推论：中日间的历史认识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情绪化”了）与中日两国的政治关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当两国政治关系恶化或“冷冻化”，历史问题就表现得比较尖锐；当两国政治关系趋于改善或“解冻”，围绕历史问

题的摩擦就表现得比较缓和。例如在2006—2008年，第一届安倍晋三内阁以及其后的福田康夫内阁期间，中日领导人开展了“破冰之旅”、“融冰之旅”、“迎春之旅”、“暖春之旅”，推动两国关系明显进步。2007年4月12日温家宝在日本国会发表题为《为了友谊与合作》的演讲，严肃地指出，“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深重灾难，人员伤亡惨重，财产损失巨大，给中国人民心灵造成的创伤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同时表示，“中国老一辈领导人曾多次指出：那场侵略战争的责任，应该由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承担，广大日本人民也是战争受害者，中国人民要同日本人民友好相处。”^[29]温家宝演讲赢得日本国会全体议员的热烈掌声达十次以上，以致时任首相安倍晋三说，“我在这里演讲只有大约一半的议员给我鼓掌，而您的演讲却赢得了全体议员的鼓掌。”这个事例很好地表明了历史问题与中日政治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中日关系改善会给历史问题的解决带来积极的有利影响，反之，中日政治关系恶化必然导致历史问题也同步地趋于尖锐化，因为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早已不仅仅是认识问题，历史问题的“政治化”早已导致历史问题与中日政治关系密切相关。

四、科学求解对日政策

所谓“科学求解对日政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方法来求解对日政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统一，而这两个“主义”又可以高度概括为四个字：“实事求是”。

习近平主席的外交思想正是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的“实事求是”精神运用于对外关系的典范，深刻体现了注重和平发展与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辩证统一，韬光养晦与主动作为的辩证统一，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辩证统一等。习近平指出，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30]

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的“实事求是”

精神运用于中日关系，值得提出以下一些观点：

第一，区分矛盾对立与矛盾统一。中日之间的矛盾和问题不等于中日关系的全部。整个中日关系是矛盾方面与合作方面并存的对立统一的关系，应该做到在注重矛盾双方对立的时候不忽视两者的统一，在注重矛盾双方统一的时候不忽视两者的对立。积极面对和化解中日关系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对日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防止一遇到某个矛盾激化，就中断两国高层之间的交往，下级部门则纷纷来个“上行下效”，双方都形成“谁对对方国家更强硬，谁在国内政治上就越有利”的局面，其结果就是两国政治关系几乎彻底断绝，这种情况形成“常态化”，显然不利于两国矛盾的解决或缓解。

第二，区分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对抗与非对抗是矛盾的两种形式。中日经贸关系中出现的矛盾一般来说属于非对抗性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合作共赢）基础上的矛盾，这种矛盾或者是由于非根本性的利害关系引起，或者是由于正确意见与错误意见的分歧而引起的，因而不必通过外部冲突的形式来解决。对抗性矛盾是由于根本性的利害冲突引起的，发展到一定阶段，很可能表现为外部冲突的对抗，中日围绕钓鱼岛争端的矛盾则属于对抗性矛盾。不同质的矛盾，必须用不同质的斗争形式来解决，对抗性矛盾只能通过对抗的斗争形式来解决，反之亦然。

第三，区分长期性问题与现实性问题。比如，钓鱼岛争端与历史问题是长期性的问题，不可能在三五年时间得到迅速解决，而且两者归根结底都是美国在战后埋下的“地雷”，如果把解决长期性问题作为解决现实战略问题的“前提”或“条件”，就会延误依据现实斗争形势的需要及时采取符合国家现实战略利益的对日政策，意味着被美国埋下的“地雷”所绑架。

第四，中日两国国内围绕如何处理两国关系问题也存在着矛盾，两国自身也成为“对立统一体”。比如在日本，就存在着重视发展对中美关系（知华派）与反对重视发展对中美关系（疏华派）的矛盾。有的日本政治家认为只要把同美国的关系搞好了，同其他国家的外交就都无所谓；有的日

本政治家则主张日本与美、中之间应该形成相对平衡的三角关系。在中国内部，由于那场侵略战争及钓鱼岛领土争端等问题，对发展中日关系则存在着乐观与悲观、积极与消极、“稳健”与“情绪化”等不同意见的矛盾。特别是在网络发达的当今，中日两国的矛盾呈现为两国内部网上网下各种强烈的不同意见内外交错的局面。

第五，中日关系是中国同一个现实的日本的关系，而不是同一个我们所期待的、理想的日本的关系。当今中国不得不面对一个变化了的、保守化的日本，不得不面对其主流媒体掀起“反华大合唱”的日本，不得不面对从战后亲美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日本政治家们。然而，决定对日关系的首先不在于对方的发展是否符合己方的期待，不在于日本怎么转、朝哪儿转，而是我国的战略利益乃至亚洲与世界和平发展的需要。

第六，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国如何对待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如何对待中国，反之亦然。中日如何在双方政策互动、互相磨合与适应对方变化的过程中构筑未来的两国关系，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第七，区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对于中日关系而言，“优先解决主要矛盾”有双重意义，其一是面对中日关系的诸多矛盾，例如历史问题、钓鱼岛争端问题、军事对峙问题等，要善于应对中日关系变化，优先解决其中的主要矛盾。比如在2001-2006年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我们紧紧抓住了历史认识问题、特别是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作为优先解决的主要矛盾，在2012年日本政府“购岛”之际，我们紧紧抓住了钓鱼岛争端问题作为优先解决的主要矛盾。其二是面对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诸多矛盾，例如中日矛盾、中美矛盾、中印矛盾、中韩矛盾、中澳矛盾等，要善于从全球视野中定位中日关系，把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准、看清、看透，把中日关系视作为“亚太地区中的中日关系”、“世界中的中日关系”，在国际战略大格局中，通过分析中日矛盾、中美矛盾、中印矛盾、中韩矛盾、中澳矛盾等的发展变化和相互作用，实事求是地将“中X矛盾”作为主要矛盾加以优

先解决，要有主有次，有张有弛，防止陷入同时应对多个主要矛盾的“囚徒困境”。

五、在“新三个世界”架构中“再定义”中日关系

中国要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日本的领导人则要打造“强大的日本”，这意味着中日两国的战略目标既有本质上的区别又有形式上的相似之处。为了实现各自的战略目标，中日两国都要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形成尖锐的结构性矛盾，而以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定义的中日关系必然会是一个无法相容的对立关系；此外，以各自的主流意识形态定义的中日关系也必然是一个充满尖锐矛盾的关系，因为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有着极为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对国际关系规范的理解差异甚大，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和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各有不同的解读，导致两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基本对立”，几无妥协余地，因此，以各自的主流意识形态定义的中日关系也必然是一个无法相容的对立关系。正是由于面对这个“死结”，笔者提出中日关系“再定义”的尝试。

石源华指出：“在中国周边已经出现新的‘三个世界’架构，中美各为一极，其间存在许多中间国家。几乎所有的周边国家对于中美两国均持平衡的基本立场。奉行在中、美之间平衡也符合中国周边国家最大的国家利益。”“日美目前结成密切的同盟关系，日本执行傍靠美国制衡中国的政策，处处与中国过不去，但日本与中国也存在共同利益，与美国之间则存在不少利害冲突，有朝一日中日关系走出困境，日本也会选择在中美之间实行平衡。”^[31]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两国关系史，两国曾经在中日美“一条线”（共同对付苏联威胁）架构（1974年-）、中日友好架构（20世纪80年代）、比较平衡的中日美三国架构（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美日同盟的“一对二”架构（21世纪初至今）之下定义过中日关系，尽管日本在中美之间的“中间国家”群当中是一个最难缠的国家，我们也需要尝试在“新三个世界”架构中重新定义中日关系。

为了在“新三个世界”架构中对中日关系进行“再定义”和科学求解对日政策，笔者建议采

用“函数”概念。^①在函数关系式 $y=f(x)$ 当中, x 是“自变量”, y 是“因变量”, y 随 x 的变化而变化, 即“因变量” y 是某个“自变量” x 的函数, 或者是某几个“自变量” x_1 、 x_2 、 x_3 …函数。

如果把中日关系看作是一个函数关系式, 把中日关系现有状态的各种变化看作为“自变量”, 把应对中日关系变化的对策看作为“因变量”或“函数值”, 那么, 中日关系就成了对两国关系现有状态的各种变化 x_1 、 x_2 、 x_3 …施加对应法则 f 进行求解而得出“因变量”或“函数值”的过程, 其中所谓“对应法则 f ”正是指我们处理中日关系的国家意志、睿智和科学方法。

中日关系现有状态的各种变化大致可分为“负面变化”即“负自变量”、“正面变化”即“正自变量”、“外部变化”即“外自变量”, 依次用 x_1 、 x_2 、 x_3 表示, 那么, 采取的对策应该是运用高度的智慧和正确的方法对上述的“负自变量”、“正自变量”、“外自变量”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进行综合的分析、求解, 包括依据形势变化对每个变量的“权重”不断加以调整的思索计算过程的结果。

一直以来, 中日关系既存在着历史认识问题、领土领海问题、台湾问题等“负自变量”, 又存在着经贸合作、民间往来、人文交流等“正自变量”, 又存在着美国因素等“外自变量”。尽管中日关系是包括“负自变量”和“正自变量”在内的多变量方程式, 但长期以来决定中日关系好坏的往往只是“负自变量”, 而且只要“负自变量”之一(例如历史问题)出现问题, 就会导致两国政府甚至民间团体在事实上断绝往来。这可以说是以“负自变量”、甚至是“单变量”定义的中日关系。

笔者提倡应该对中日关系进行“再定义”, 就是主张改变迄今仅仅以“负自变量”、甚至是“单变量”来定义中日关系, 而应该以包括“负自变量”和“正自变量”在内的“多变量”来定义中日关系, 比如不要因为历史认识问题的摩擦而影响两国的民间往来和人文交流, 因为扩大中日之间的民

间往来和人文交流恰恰是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相互感情, 解决中日历史认识问题的根本途径。

至于中日之间有哪些“负自变量”、“正自变量”、“外自变量”? 可以列出很多, 比如“负自变量”有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争端、中日相互之间的军事斗争准备、不利于中日关系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变化等; “正自变量”有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环保合作、有利于中日关系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变化、中国制造业投资日本的趋势逐渐加强^②、将“一带一路”视为商机的日本民间企业日益增多、安倍首相向习近平主席表示要对“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合作等; 至于“外自变量”往往具有正负两面性, 比如日美同盟加强属于“负自变量”, 日美互信减弱属于“正自变量”, 日印、日澳、日韩等发展安全关系存有牵制中国的图谋, 也属于“负自变量”等等。在求解对日政策之际, 必须要把影响中日关系的各种自变量考虑周全, 避免有重要遗漏(上面仅仅列出了一部分自变量), 而且在利用上述自变量之际, 必须根据形势变化准确地对各个自变量加上“权重”, 比如, 在2001年至2006年, 我们对历史问题这个“负自变量”和经贸关系这个“正自变量”所加的权重比较突出, 以致形成了两国关系“政冷经热”的局面; 在2012年日本政府“购岛”之际, 我们对钓鱼岛争端问题所加的权重非常突出, 甚至达到了近乎以“单变量”来定义中日关系的地步, 这是因为国家主权利益问题是一个特殊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自变量,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 “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谁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32]

上面列举了很多“自变量”, 那么, 有哪些“因变量”(对策清单)呢? 从过去的经验看, 审时度势地采取过的具体对策有: 在适当时机举行高级别会晤甚至两国首脑互访、建立危机管控机制、

① “函数”是中学数学课教过的概念, 相信不会让文科出身的读者感到为难。

② 例如中国大型企业“长城汽车”2016年在横滨市设立研发基地, 开始研究电动汽车、自动驾驶等技术; 已经在日本拥有研发基地的中国通讯设备巨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计划在2017年内首次在日本新建生产通讯设备及相关器材的大型工厂, 并将吸收日本技术和人才(「日本经济新闻朝刊」2017/6/29付)。

加深经贸合作（包括吸引日资和对日投资）、加强在环保、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等等。在有些场合，如果采取的对策未能奏效，就需要审视“求解”过程以及对各个自变量所加的权重是否适当，是否应该通过外交创新找到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新谋略、新对策和新议题。我们不应低估我国塑造未来中日关系的能力，日本究竟是我们的“善邻”还是“恶邻”，主要取决于至今仍然念念不忘完成美国交给的功课的日本，^[33]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塑造这个难缠难解的邻国。总之，“中国因素”作为影响日本国内政治的“外部因素”之一将如何起作用？如何与影响日本国内政治的最重要“外部因素”的“美国因素”展开博弈，是值得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我们身边是出现一个“善邻”还是“恶邻”的问题。

这里，再回到“中日关系再定义”。其实，我国与包括印度、印尼、越南、菲律宾等周边各国关系同样存在着“负自变量”与“正自变量”，如果都以“负自变量”或“单变量”来定义我国与周边邻国或邻近国家的关系，有可能使我国陷入“刚按下葫芦又浮起瓢”的四面树敌的境地，将可能严重损害我国为实现两个百年伟大目标所需的稳定的周边国际环境。应该说，近年来中菲关系的发展固然与菲律宾总统更迭有关，也是我国采取以包括“负自变量”和“正自变量”在内的“多变量”来综合地定义中菲关系所取得的重大外交成果。总之，笔者主张的“中日关系再定义”应该扩大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再定义”，针锋相对地还击域外霸权国逐一挑拨离间我国与周边邻国和邻近国家之间关系的战略图谋，“争取更多的中间国家站在自己一边或更多地倾向自己，会成为中美两国博弈的重要内容。”^[34]

参考文献：

[1] 冯昭奎. 经济超日本 10 倍，中日才太平 [N]. 环球时报, 2013-2-8.

[2] Norman Alcock and Alan Newcombe, “The Perception of National Powe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14,1970,pp.335-343.

[3] 汉斯·摩根索著. 国家间的政治 [M]. 杨歧明等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151-197.

[4] 黄硕风. 综合国力新论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5] Power Rankings list [OL]. <https://www.usnews.com/news/best-countries/power-full-list>.

[6] 习近平致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贺词全文 [OL]. http://news.xinhuanet.com/zgix/2014-11/19/c_133800180.htm, 2014.11.19.

[7] 习近平.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OL]. <http://cpc.people.com.cn/n/2014/12/07/c64094-26161930.html>, 2014.10.01.

[8] 习近平. 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

[9] 习近平.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OL]. <http://cpc.people.com.cn/n/2014/12/07/c64094-26161930.html>, 2013.09.30.

[10] 世界の研究開発費 国別ランキング・推移 (OECD) [OL]. <http://www.globalnote.jp/post-1683.html>, 2017.08.08.

[11] 各国の研究開発費の国際比較へ [OL]. http://data.nistep.go.jp/sti_indicator/2016/RM251_11.html.

[12] 技術貿易へ - 科学技術指標 2016 [OL]. http://data.nistep.go.jp/sti_indicator/2016/RM251_51.html.

[13] CCTV 深度国际：日本，危险的潜实力 [OL]. <http://tv.cntv.cn/video/C17609/948671672d89491ebf3465641f4c41e5>, 2015.07.31.

[14] 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17 [OL]. <https://www.insead.edu/sites/default/files/assets/dept/globalindices/docs/GII-2017-report.pdf#search=%272017+GII+report+regional+innovation+cluster+index+evaluation%27>.

[15] CCTV 深度国际：日本，危险的潜实力 [OL]. <http://tv.cntv.cn/video/C17609/948671672d89491ebf3465641f4c41e5>, 2015.07.31.

[16] 科技是现代战争核心战斗力 [OL]. <http://xh.xhby.net/mp3/pc/c/201707/20/c352684.html>, 2017.07.20.

[17]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OL]. http://theory.gmw.cn/2014-09/16/content_13244295.htm, 2014.09.16.

[18] 环保部：我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接近上限 [OL]. http://news.ifeng.com/a/20160425/48580059_0.shtml, 2016.04.25.

[19] 杨夏鸣. 日本宪法第九条起源及其原因 [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8,(4):131.136.

[20][23] Minutes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N]. *The Official Gazette Extra*. 1946 (35) :26、171-172.

- [21] Contemporary Japan[J]. Vol. XIX, Nos. 1-3, (Jan.- Mar. 1950). P139.
- [22]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N]. Vol. XX, May 18, 1951. p60.
- [24] 修宪设立“国防军”安倍意欲何为 _http://news.cntv.cn/special/pinglunjp/jpamy/。
- [25] 安倍在日本国会上院选举中获得大胜 [OL].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8391/, 2016.07.11.
-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编辑部编. 日本热点问题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20.
- [27] 毛里和子. 重建日中关系 [J]. 日本学刊, 2013, (4): 25.
-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编辑部编. 日本热点问题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21.
- [29] 友情と協力のために——日本国国会における温家宝総理の演説 [OL]. http://www.china-embassy.or.jp/jpn/zt/wenjiabaozonglifangri_jp/t311936.htm, 2016.11.10.
- [30] 习近平阐明中国和平发展原则底线 [OL].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1/30/c_114560069.htm, 2013.01.10.
- [31] 石源华. 中国周边已经出现新的“三个世界”架构 [J]. 世界知识, 2017, (15): 16.
- [32] 习近平: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 [OL]. http://military.china.com/important/11132797/20170802/31025955.html, 2016.11.11.
- [33] 王毅对日本新外相发言表示失望: 你很好地完成了美国给的任务 [OL].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55014, 2017.08.08.
- [34] 石源华. 中国周边已经出现新的“三个世界”架构 [J]. 世界知识, 2017, (15): 16.

(责任编辑 于振冲)

Reflections o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Japan, “a good neighbor” or “a bad neighbor”

Feng Zhaokui

Abstract: Since modern times, China had been defeated by countries whose economic aggregate was far inferior to our country. In fact, China was not lost on the scale of economy, but lost for the backwardn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view of this historical lesson, although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the comparison of the strength of big power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cale of GDP and the scale of military expenditure associated with it, we must not underestimate the comparison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ength behind GDP and the growth of military expenditure. Japan is still a big technological power. 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the core fighting force of modern warfare, we must pay great attention to the military significance of Japan'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ength. On the question of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the efforts of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government attempting to amend the peace constitution failed again and again, resulting in a rare phenomenon in the World constitutional history after the post-war Japanese Constitution went through seventy years without changing a single word. Fundamentally, the reason for the failure of the Japanese right wingers to modify the pacifist constitution is that their intention is a departure from the will of most Japanese people who are the creators and defenders of the pacifist constitution.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the dichotomy theory” of distinguishing a handful of militarists and Japanese people and the so-called “Theory of crime by the whole people” proposed by HE Fang are not contradictory, on the contrary, they can be unified, even though “crime by the whole people” is indeed a fact,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rimes committed by a few militarist rulers and the crimes committed by ordinary Japanese people before and during the war. “Theory of crime by the whole people” tells us, Sino-Japanese historical issues should include both sides, one side is against the wrong words and deeds of Japanese ruling class leaders on the historical issues while another side is Chinese people, as the winner of the war, should educate and affect the Japanese nation who had committed crimes. Today, a new “Three Worlds” architecture has appeared around China, wi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ach taking a pole, during which there are many middle countries, we should “redefine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new “Three Worlds” architecture.

Key word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echnological strength; pacifist constitution; “Theory of crime by the whole people”; “new Three Worlds”